

绪 论

一、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人类经济活动产生和发展的地域表现。它运用综合和区域的观点从自然、技术、经济、社会的相互联系以及市场需求及其变化中研究经济活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有效布局的客观规律,并进而研究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经济发展的部门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形成、发展、转换、演变的规律。

实际上,关于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阐述历来不乏歧见,且一直处于发展之中。无论是从经济学还是地理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人,对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认定,均处于发展之中。

经济地理学作为一个由“经济”和“地理”两个词(复合名词)构成,由众多学者参与研究,置身于两个不同的科学领域(经济学、地理学),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进行探讨的学科,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持不同的观点,或者对同一现象作出不同的阐述和概括,是不难预见的。

在近代和现代经济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曾有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不少学者阐述过各自的看法。他们分别认为经济地理学是“将地球空间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舞台”^[1];对地区经济过程配置的理论探讨^[2]或是“经济生活形态或类型的配置分析”^[3];“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无机环境和有机环境对人们经济活动的影响”^[4];“经济地理学的对象是不同地点人们用以取得生活资料的方法的相似性和差异。经济地理学者研究的是经济过程,特别是为具体地方一些与之有联系的现象所改变了的经济过程”。前

苏联的经济地理学者则认为，“经济地理学是一门关于地域的社会经济系统的形成、发展、起作用的过程以及管理这些系统的科学”，“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地域系统，以及人们生产活动和其他一些社会活动的地域表现”。

我国经济地理学者主要分布于经济学、地理学的教学与科研单位或其他部门，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气候，大多认为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生产布局的学科，也有人认为是研究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的生产布局，因而使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带有若干神秘或神圣的色彩，使研究者有一种使命感，却又不肯深究。80~90 年代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宽松，国内外关于现代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成果与信息大增，研究领域扩大，理论上有所发展，方法上亦有革新。在此情况下，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地理学是研究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空间组织（或布局）的形成、发展条件、特点和规律的科学。也就是研究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整个再生产过程中空间结构优化的科学；研究经济布局规律的科学。其中生产力布局是经济活动空间组织的最重要部分”。

二、经济地理学的学科性质

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看出，它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经济学的关系较为密切，是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对其科学属性历来有三种说法：有人认为它属于社会经济科学范畴；有人认为它属于地理科学范畴；有人认为它属于社会经济科学和地理科学交叉的边缘科学范畴。

经过近二十年来经济地理工作者（包括分散在各业务部门或科研、教育机构中的具有经济地理学素养的人员）广泛参与各部门多种多样的业务实践，推动了经济地理学的新发展。现今，经济地理学已发展成为一门介于经济学、地理学、规划学、工程技术学和环境生态学之间的学科。

三、中国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按照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差异,通常可将经济地理学分为综合经济地理学、部门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学。有时也将人口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等包括在内。20世纪80~90年代盛行的区域(包括各个层次的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设想,现代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城市总体规划(包括编制与修订),城镇、村镇建设规划、计划,开发区布局与规划,中等城市发展态势研究,小城镇发展方式研究,乡村城市化研究,村镇建设小区规划,城市社区建设、旅游资源与重要景点开发规划,土地定级估价,房地产开发区位选择,房地产开发回报率研究,现代化村镇住区开发经济评估,铁路通道、高等级汽车专用道路(包含高速公路)、水运港口、民航机场、大口径长距离运输管道等的选线、选址和规划建设方案等等,也都包含丰富的经济地理学内容,需要经济地理工作者或具有经济地理学素养的人员承担或参与完成。

中国经济地理学是一门区域经济地理。通过对中国及各地区影响生产力布局诸因素的分析,研究探讨中国生产布局的条件、特点及其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其基本任务是对全国及国内各地区的经济地理面貌,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总结生产力布局的正面、负面影响及其经验教训,为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生产力合理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向社会普及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使人们了解中国生产布局的基本轮廓、中国地理环境和国土资源的基本特征,提高人们按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的认识能力和管理水平。

第一章 经济布局概论

第一节 我国经济发展与布局的展开

如果说 20 世纪 50~60 年代在内地建设新城市与新工业基地是使经济布局在全国范围内作了初步展开的话, 80~90 年代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增长, 则使经济布局在较高的层次和更广的地域空间内进一步展开。到 1998 年,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 正进入体制创新、结构转换、适度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目前, 我国经济总量与综合国力已上升到新的高度: 1997 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74 772 亿元。若按世界银行汇率法估算, 1997 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GNP) 为 10 554 亿美元, 在世界上位于美、日、德、法、英、意之后, 居第七位; 从主要工农业产品在世界地位来看, 我国居世界前列者在 1997 年已增至数十种, 其中谷物、棉花、水产品、原煤、水泥、布、生丝、丝制品、钢、电视机等的产量均居世界首位。但人均占有这些产品的水平却比较低, 1997 年除水产品一项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以外, 其余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 我国仍然是世界上外资流入的热点地区。至 1997 年底, 我国内地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约 30 万家, 1978~1997 年实际利用外资 3 483 亿美元, 仅次于美国, 居世界第二位。

此外由于 20 世纪 90 年代外向型经济比重提高等原因, 海关进出口贸易额已连续多年超过 3 000 亿美元, 1997 年达 3 251 亿美

元居世界第十位。加上出口结构改变，顺差增加到 1998 年 11 月底，我国内地的外汇储备增至 1 445 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

经过持续多年来实行全方位、多层次调整的结果，国民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的问题已有所改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产业严重滞后的局面已经初步得到改变；电力、煤炭、石油与天然气、钢铁、有色金属的生产均已形成同国力大体相适应的规模；机械、电子、石化、汽车制造、建筑业等也获得重要发展，目前正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住宅建设也已成长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纺织工业和轻工业则根据原料产地变化和产品销售状况进行重大调整，其结构与布局发生了重要变化。

但是，多年以来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域布局等方面的调整，并未完全达到目的。迄今为止，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仍然是经济结构不完善和经济效益差以及一些产业布局不够合理。如在地区产业结构方面，趋同化非常严重，中部经济地带与东部沿海经济地带工业结构的相似率达 93.5%；西部经济地带与中部工业结构相似率达 97.9%。在已知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制定的“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规划中所涉及的选择支柱产业等方面，又出现了新的重复建设、结构趋同现象。

为此，迫切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在充分考虑国家整体布局和市场容量的前提下，选择本地区或本系统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特色经济。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直接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是市场经济发展壮大主要场所，因为市场需要以城市作为载体和依托，市场经济向高层次的发展和完善，只有在城市化进程中才能实现。至 1997 年 12 月 31 日我国大陆设市城市增加到 668 座，比 1990 年增加 201 座；建制镇总数更是激增到 18 316 座。从不同规模城市的发展特征及其趋势来看，1997 年

市区非农业人口 100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为 34 座,50~100 万人口的大城市达 47 座,它们之中的多数在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都处于具有活力的状态;20~50 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为 203 座,增长幅度最大,比大城市更具活力;20 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 384 座,增幅居第二位,仅次于中等城市,也成为具有活力的城市群体。

上述演变带动我国城市结构体系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大、中、小城市结构比例,从 1989 年的 1:2.0:4.7,改变为现在的 1:2.5:5.0,向基本合理的城市结构体系迈进了一步。

上述变化表明,我国大陆的城市化已经出现新的态势,进入到一个活跃的发展时期。如果按近年城市化发展的平均速度推算,至 2010 年,我国大陆将出现 1 000 个以上不同等级、类型、规模的设市城市和 25 000 多个建制镇,并形成庞大的城镇体系。其时,全国的城市化水平也将由 1997 年的 30% 提高到 45% 以上。

由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必然会在具体的地域范围内体现出来,有关经济地理学的各种专题研究便应运而生。目前,地域经济综合开发已成为经济学、地理学、城市科学以及生态学、环境保护、规划学等诸多学科竞相研究或联合探讨的领域。在中国经济发展地域分布以及生产力布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当前,我国存在着各种层次的区域(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地区(地级市)、县(县级市)、乡(镇)、村等,其中省一级区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跨省区的“经济区域”(或“经济带”)的作用亦越来越显得重要,使人们刮目相视。与此同时,由于乡(镇)村企业异军突起,使乡、村两级的经济实力明显增长,其经济结构和地域布局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以省级区域为例,我国现有 34 个省区(23 个省、4 个直辖市、5 个自治区、2 个特别行政区),在全国经济运行中的功能近十多年来都有相当大的加强。但因资源、区位等条件不同,以及对外开放

程度和时间上的先后、历史文化传统和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差异，使各省区之间在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支柱产业的选择和培育，经济布局的展开等方面，渐渐地拉开了距离，而且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有越拉越大的趋势。

据统计，1981 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为 5 178 亿元，工业地域分布的实力，其顺序依次是：上海、江苏、辽宁、山东、四川、黑龙江、广东、湖北、河北、北京、浙江等省市。到 1997 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 113 733 亿元，不仅数量增长多倍，而且在地域经济发展的格局上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工业地域布局实力的顺序改变为：江苏、广东、浙江、山东、辽宁、河北、湖北、上海、河南、安徽、福建等省（市）。如果以包括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商业、运输、邮电业等）在内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计算，则地域经济实力的顺序为：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河北、辽宁、湖北、上海、四川、福建。而以海关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地域排序是：广东、上海、江苏、山东、福建、浙江、北京、辽宁、天津。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总金额的地域排序则是：广东、江苏、上海、福建、山东、天津、辽宁、北京、浙江、河北、湖南。

从以上排序的演变，可见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在近二十年中上升最明显。其中广东经济发展和布局的展开，主要是从珠江三角洲向周边及外围地区扩展；江苏是从苏南向苏中和苏北扩展；山东是从胶东半岛沿胶济线和济青高速公路扩展；而福建经济的发展和布局，则是从近乎空白的状态开始，由一南（厦门）一北（福州）逐渐向中央沿海地带扩展。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在 20 世纪 90 年代对原有工业进行了战略性调整，高新技术产业崛起，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全市工业经济运行质量和结构层次提高了一大步，在布局上则通过开放开发浦东新区，使之成为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与此同时，上海的外贸、国际金融、交通运输、电讯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等，均得到了很大发展，使城市的辐射能力和辐射范围扩展，正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

从 20 世纪 80~90 年代我国跨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区域”或“经济带”开始崛起，并正在发展成为全国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层次。

当今区域经济怎样进行多层次的规划和发展，在现有的以全国和省级行政区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生产力布局的空间范围以外，研究和探索其范围比全国小而比省区大的区域，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生产力布局的规划和实施，也是涉及到全国生产力布局的重要环节。在这样的区域内，以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经济布局等方面的有机联系和资源、区位优势互补为纽带的经济规划，开始受到重视，有的已走上正轨。

从 1992 年开始，国家计划部门和经济科学、经济管理专家，重点研究了“7 大经济区域”或“经济带”的经济发展和战略布局方案。

至 1996 年，关于 7 大经济区域划分的思路又有新的拓展。考虑到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影响，在未来十五年（1996~2010）内，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地理特征，势必突破行政区划界线，在已有经济发展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已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如下 7 个跨省经济区域，并以此为格局推动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布局的渐次展开。

新的 7 大经济区是：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东北地区、中部 5 省地区、西北地区。

由于上述 7 大经济区在各自优势和有利条件基础上的竞相发展，预计在我国大陆可能出现一种新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布局展开的态势。届时，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化趋势将更为明显。从静态的

观点来看,经济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部沿海地带、沿江开放带、环渤海地带以及东北、中原、西南、西北等大小不等的经济区域之间的经济运作,具有各自的特征,而且各自的水平差距很明显;从动态观点来看,经济发展将出现整体推进的势头,其推进的宏观轨迹是从沿海到内陆,从东到中到西。其间 城镇体系的布局沿交通线(包括水路)点轴集中化加强,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加快,而且这种增长由过去的以自然增长为主转向以机械增长为主,即主要通过农村剩余劳力向城镇转移的方式来实现。此外,城市人口的居住空间和环境及生活质量出现了较大幅度提高。但是,在经济发展和布局展开中,对环保重视不够,不少地方出现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令人始料不及。

第二节 影响经济布局的主要因素分析

总结我国历史上(特别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经济布局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布局问题与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布局合理可以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亦有利于社会发展;布局失误,则将造成难以弥补的经济损失。如果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项目布局失误,还将损害国民经济全局,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甚至严重污染环境,危及生态平衡,遗祸于子孙后代。

经济布局,作为经济发展的空间形式,其发展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国、一地区经济布局特征的形成,通常同该国、该地区的自然资源、知识与智力资源、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包括历史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策略、政策变化、生产关系等)诸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一、自然资源因素

自然资源是指人类可直接从自然界获取并用于生产、生活的

物质和能量，是自然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土地资源、气候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矿物资源、海洋资源、能源资源和旅游资源等。它们对于经济的发展及其布局，产生经常的和重要的影响。

对自然资源的适度开发和有偿使用，不仅可以带来长远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也能促进自然资源本身的可持续利用；反之，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只会给经济发展及其布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度作为我国某些地区资源开发政策的“有水快流”式的开发，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短时期获利而已，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根本原则是不符的。联系到目前我国已进入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的时期，指出上述这一点尤为重要。

我国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曾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失误和教训较多。如 20 世纪 50~80 年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是通过开发自然资源而取得的。当时，一方面在指导思想上有盲目的“地大物博”观念，即便是在多数自然资源未经详勘、家底不明的情况下，仍然固执地认为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到 20 世纪 80 年代甚至还正式肯定并鼓励所谓“有水快流”的开发模式，在经济布局上则是遍地开花，重复建设；另一方面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又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资源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程度等指标同先进国家相比差距很大。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上述情况才开始有所改变。面对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的现实，长期以来盲目乐观的“地大物博”的提法才被“人均资源严重不足”等理智的提法所代替。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有关部门进一步提出对全国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战略及具体方案，开始注意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的档次。在大力加强对各种资源勘探的基础上，形成合理规模的适度开发，同时，通过对有限自然资源的深加工与精加工，获取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在经济布局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对策。

二、知识与智力资源因素

除自然资源因素以外，知识与智力资源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布局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提法是：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力资源，是一国一地区进行生产活动的必要条件，即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制定生产布局方案时，对员工的素质要求逐渐提高。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的悄然兴起，使知识与智力资源因素成为影响生产布局的重要因素，它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如果说农业经济发展是以土地与劳动力为基础，工业经济又是以大量耗用矿物、能源等进行加工制造为特征的话，知识经济的发展则以不断创新且层次较高的知识为动力，它是一种富于智慧而又变化迅速的新经济形态。如美国的5000家软件公司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上述情况表明，在当前情况下，知识已逐渐发展成为生产要素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到1998年，在全球排名位居前列的各大公司名单中，一向以制造业和重化工而位居前列的许多日本公司，名次大倒退，而像美国微软公司等名次则直线飙升。

在知识经济迅速崛起的情况下，产品制造模式开始转向知识密集型产品，伴随而来的是柔性制造系统时代的到来，它使制造业竞争中劳动力成本的作用降低。在知识经济的模式中，投资方向正发生巨变：由有形资产转向无形资产。随着产品中所蕴含的知识量成为竞争的基础，无形资产的地位逐年提高；知识、科技先导型企业成为经济活动中最具活力的经济组织形式；高新技术园区崛起，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便是美国西海岸湾区的硅谷（矽谷）。

相对于近年来发达国家以软件业为代表的知识经济的崛起，我国知识经济发展还刚刚起步，但在某些地方或城市已列入经济发展战略方案之中。如北京在1998年提出了发展知识经济的设

想；而上海的知识经济则已成为全市经济新增长点中的第一热点。

从知识经济发展的基础来看，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已具备了一定的条件。迄今为止，以国内生产总值、人均产值等指标名列前茅的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其经济发展规模、经济结构演变及其布局态势的形成，除政策、区位因素以外，还同其自身的知识和智力资源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北京的信息产业和知识经济在 90 年代的蓬勃发展，并最终获准定位为“首都特色经济”；上海高新技术从 1996 年开始成为上海经济的主要支撑点之一；深圳则以信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工业为主导，对外经济贸易发达为其特色。上述 3 大城市又几乎都是移民城市：上海是最早的移民城市，其经济发展和结构最接近市场经济，是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性的工商业、金融及管理人才集中地；深圳为最新的移民城市，并从一开始就形成外向型经济结构，是京、沪、穗等地高、中档人才来此集聚并共同运作的产物；北京在作为共和国首都之后，吸引来自全国各地（主要是沪苏浙辽粤湘等地）的人才，逐渐形成高密度的智力集聚。90 年代后期北京之所以能够提出以发展首都经济、知识经济为特色，主要仰赖于人才的集聚这一优势。

由此可见，在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高素质人才比例增加与流动性加大，知识与智力资源因素对经济布局的影响力更趋明显。

三、生产技术与工艺流程的变化

在对经济布局产生经常和重要影响的因素中，生产技术与工艺流程的变化有时也很重要。例如在近几个世纪，钢铁工业的自然资源条件虽有所变化，但变化不是很大。然而，钢铁工业的采矿、冶金技术和运输技术却发生了巨变，使钢铁工业布局随之出现根本性变化，由原来主要靠近煤产地变为趋向铁矿、交通枢纽（如港口附近）钢材消费地。

又如历史悠久的造纸工业，在近几十年中相继在各地建立起一批现代化大中型企业，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造纸工业的原

料工艺路线。传统造纸工业耗用大量植物纤维以及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污染，一直是造纸工业生产与布局中难以克服的缺陷。而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研究、90 年代才投入工业化生产的合成纸工业问世后，成为继蔡伦发明造纸术 2800 年以来最彻底的一次革新。预计在 21 世纪，传统造纸工业可能被合成纸生产逐渐取代，整个造纸工业的布局也将发生划时代变化。

石油加工工业布局的变化也是如此。近二十年来我国炼油和石化工业布局原则的变化充分体现了生产技术等因素的重要作用。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及其以前，我国大陆的多数炼油厂建在原油产地附近，而 80~90 年代建设的炼油厂则多数布置在石油加工产品消费地附近。因为在现代运输技术条件下，向消费地运送原油比分别运送各种成品油以及各种化工原料要经济合理得多，且运输原油比较安全、方便。另外，炼油工业的中间和下游产品日益增多，其产品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生产装置与辅助装置格外多样、复杂，在消费地附近建设与布局，可以从当地得到科研、中试与工业技术方面的充分协作，并可就近招收具有较高技术素质的员工，有利于其庞大复杂设备的综合调试和安全运营。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上述情况又有所变化。由于大量进口原油，且运距长、运费较高，遂倾向于建设特大型（1 000 万吨级）炼油厂。在此情况下，拥有深水岸线且距稳定货源地较近的港湾（如水东港等）附近，才是炼油厂选址建厂的首要条件。

四、社会经济因素、政治环境和政策变化

要充分估计历史发展对生产布局的影响，也要估计到地区生产布局的历史遗产，利用其有利因素，促进生产发展和合理布局。特别要看到某一时期的政治环境和政策变化，往往促使生产布局发生跳跃式变化，从而产生种种有利的或不利的的影响。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常常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策，因而在生产布局 and 整个经济发展格局上，也会打上深深的“政策烙印”。

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我国工业建设及其布局，就注意做到边发展边改造沿海老工业基地，同时在内地积极建设新工业基地。结果，对全国经济发展和合理布局有利；“二五”期间（1958~1962年）以后改变了这一正确做法，消极地限制沿海地带经济发展的规模，盲目地在内地建设过多项目，结果欲速则不达。此后，不仅不接受教训，反而在大规模展开的“大三线”建设中走得更远，使布局上的失误更大。

从1964年开展的“大三线”建设，在我国内陆的长城以南、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乌鞘岭以东的广大腹地地域（包含13个省、自治区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即“大三线地区”之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且旷日持久（历时17年）的建设，同时对全国经济发展格局进行重大的调整。结果，总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0亿元。其中建成大中型骨干企业近2000个，涉及冶金、航天、航空、电子、化工、机械、核能、造船等部门，并建成10条铁路干线。然而，在上述地区内所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仅仅经历了短时间的运作，从“七五”（1986~1990年）开始，又被迫进行搬迁改造。迄今为止，已投资约200亿元，对数百个项目通过关、停、并、转、迁等方式实施布局调整。目前，三线建设项目的搬迁改造还在继续进行。究其原因，主要是在那个年代未能客观冷静地估量国际国内局势。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使若干重要产业的许多项目（包括主要新发展项目和多数由沿海地带内迁项目）的发展及其布局进入误区。总的来说，存在布局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三大问题，更有相当多的企事业单位建在地质构造复杂、水质恶化、山体滑坡、地下溶洞等自然环境恶化的基础上，使生产和生活面临威胁。直到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后期，还在为消除三线建设在布局上的失误而付出昂贵的代价。当然，经过搬迁改造以后的一些企业，现已发展成为国家或地区的某些产品的生产基地，并已形成效益，但许多三线建设项目在布局上的失误却只能作为惨重的教训而成为历史。

生产布局与社会经济因素、政治环境和政策变化的密切关系，在近二十年来的表现也是很明显的。我国经济发展及其布局的展开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此期间，数以千计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包括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以及机电、轻纺、军工、科教文卫等方面的很多大中型项目在布局上有一部分做到了反复论证、遵循客观规律，故而能够进入良性状态，达到了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有的还兼顾了环境效益。其所以获得上述较好的效益，无疑同这个时期国家和各地区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巨大变化是分不开的。贯彻这些方针、政策，对于推动经济加快发展和合理布局，无疑是一个有利因素。

又如 在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方面 在 1979~1997 年期间 我国累计已实际利用外资 3 000 多亿美元，利用外资规模在全球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在各发展中国家居首位 这对促进区域经济开发和推动布局的展开，是十分有利的。但是，也存在外商投资结构（含部门结构和地域结构）不够合理等问题。在 3 000 多亿美元的外商投资总额中，有 50% 集中于一般加工工业，30% 投向旅游宾馆和房地产业；只有 10% 投向电力、石油等基础产业，1.8% 投向交通运输，1.5% 投向农业；即使是在吸引外资最多的加工工业中，外商投资也仍以劳动密集、加工型为主，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虽有所发展，但所占比例仍然较小。

为此 在“九五”（1996~2000 年）期间，我国逐步调整外商投资结构，通过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的有关政策，引导外商投资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和大型骨干项目等。在此期间，预计我国大陆将吸引外资 2 300~2 700 亿美元 在投资结构方面将积极引导外资投向农业新技术和土地资源综合开发、水利、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机械、电子、矿业等国家急需发展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同时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企业的技术经济效益；房地产业的吸

引外资则鼓励投向住宅建设，控制高档房地产和高消费服务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正在引导和调整外商投资的地域结构。1996年开始实施的国家产业政策向西倾斜战略即包含上述内容。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等方面实行同等优先、重点支持的原则，并适当放宽外商投资领域。凡能发挥中西部地区人力和资源优势并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均属鼓励外商投资领域。

此外，国际局势是否有利，以及国内经济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是否得当，也会对经济发展和布局产生一定影响，包含正面、负面的影响。后者对某个地区和某一部门来说，在短期内还可能是带有全局性和结构性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因此，必须尽快发现及时采取新的调控措施加以弥补。

1997年，国家有关部门发布政策信息，确定16个重点建设地区，意在引导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布局。这16个重点建设地区分别是辽宁中南部地区、京津唐地区、山东半岛、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珠江三角洲、海南和北部湾沿海、红水河地带、哈尔滨—长春地区、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基地、长江干流中上游沿岸、陕西关中、以兰州为中心的黄河干流沿岸、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天山北坡地区、攀西—六盘水地区、乌江和黔中。

其中，在辽宁中南部地区重点发展钢铁工业和门类齐全的重型机电设备制造业等；京津唐地区加强机械电子工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山东半岛重点开发石油和海洋资源，加快石油化工和海洋产业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加快机械电子工业、石油化工、汽车等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发展；闽南三角地区以发展劳动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为主；珠江三角洲地区在目前接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海南、北部湾沿岸地区发展具有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 and 一定的资源优势；红水河电力和有色金属基地逐步建成全国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哈尔滨—长春地区主

要抓好石化、汽车、机电工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基地重点开发煤、铝等资源，也是东部耗能产业的良好接纳地；长江干流中上游沿岸地区则利用本区水陆交通方便，水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发展水电、钢铁、有色金属、磷和盐化工业。陕西关中地区重点考虑机械电子工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同时是接纳东部地区纺织工业向西转移的理想地区；以兰州为中心的黄河干流沿岸地区可为开发新疆石油资源提供钻采设备，在接纳东部地区有色冶金、石油化工、化肥向西转移等方面也具有重要地位；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天山北坡地区是东部地区石油加工、轻纺工业向西转移的重要接收基地；攀西一六盘水地区是冶金、能源、化工基地，主要发展能源、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化肥工业；乌江电力和黔中铝、磷基地主要开发水电，发展磷肥，炼铝工业。

第三节 经济布局合理化 理想与现实

经济布局合理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经济区网络，长期以来就是一种被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的地域经济形态。可是，现实与理想常常有很大差距。这就促使更多的人对它重视，从各自不同角度（经济、地理、城建、技术等）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通常说来，布局问题涵盖面甚为广泛，大以至于整个国家生产力战略部署、海洋综合开发规划；小以至于高科技产业园区开发、核电站选址、航天器发射窗口排列，乃至居室空间安排，从宏观到中观、微观，都有微妙的“布局”思路。

经济布局合理化的主要内容，包括工业发展结构优化和合理布局，还包括大农业发展的地域组合、城镇体系的规划和建设，以及城乡建设中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与实施等。根据近五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及布局中许许多多的经验教训，关于经济布局合理化的思路，大致可以概括为：